

# 牛李党争的分野

李艳丽

**摘要** 本文探讨了我国历史上的牛李党争,对其的特殊历史背景及社会因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。

**关键词** 牛李党争 分野

中图分类号:D691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9-0592(2008)12-387-01

所谓牛李党争,通常是指唐代统治后期的九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、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、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。牛李两党自宪宗元和三年(808年)因科举问题结恨,至宣宗大中三年(849年)李德裕死于贬所崖州,列为朋党,两相倾轧,纷嫌排陷,垂四十年。“以致文宗有‘去河北贼易,去朝中朋党难’之叹。”

牛李党争由进士考试而起。唐宪宗元和三年(808年),牛僧孺、皇甫湜、李宗闵三人对策时痛诋时政,宰相李吉甫大为不满,在宪宗面前哭诉。因此宪宗将考官和审查考卷的翰林学士免职贬官,牛僧孺等三人也不予重用。事后颇有人上疏为牛僧孺等鸣不平。宪宗又于同年出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,初步形成两派对立的形势。元和年间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藩镇割据。宰相李吉甫、武元衡、裴度等主张武力平叛,另一派宰相李绹、韦贯之、李逢吉主张安抚妥协。由于宪宗和当权宦官支持前者,因此,主战派得势,反对派则利用舆论与之抗衡。李吉甫死后,主战派的中心人物是裴度,反对派的中心人物是李逢吉。

长庆元年(821年)进士科考试中,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贡举不公,翰林学士李德裕、元稹、李绅也都说段文昌所揭发是实情。李宗闵等人都因此被贬官。双方各从派系私利出发,互相排斥。此后在穆宗、敬宗、文宗三朝,除去大和九年(835)甘露之变前夕,牛李两党都被当时掌权的李训、郑注排斥朝外,大体上是两党交替进退,一党在朝,便排斥对方为外任。开成五年(840年)文宗死,牛党和他们依靠的宦官所支持的继承人未能继位,另一派宦官拥立唐武宗即位,牛党失势。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为宰相,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。李德裕虽在会昌年间讨平泽潞叛乱、破回鹘、废佛教等几个方面作出成绩,但他独断专行、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但不为反对派所憎恨,也为宦官所不满。会昌六年(846年)宣宗即位。宣宗早就厌恶李德裕,即位之后即贬之外任,李党纷纷被斥。牛党相继入相,牛僧孺、李宗闵也被召还朝。李德裕被贬为崖州司户,死于贬所。牛李两党之争终于以牛党获胜结束。

对于牛李党争的分野,历来有不同的说法,我通过查证有关史料,加以分析,提出如下观点:

## 一、地域及出身

我们来看牛李两党的领导中心,一般来说牛党以李宗闵、牛僧孺二人为首,因僧孺早于宗闵任宰相一职,声望凌驾其上,无形中僧孺为牛党重要领袖,李党则以李德裕为首。英人崔瑞德主编《剑桥中国隋唐史》述及牛李党争时,谓牛党共41人,其中郡望出身者20人,非郡望出身者5人;李党共22人,其中郡望子孙12人,非郡望出身者7人。据文献记载,牛李党争中两派主要成员的郡望分布具有及其突出的地域特征,李党成员主要是山东郡姓士族,牛党成员基本上是关陇士族,因此,牛李党争并非士族与庶族之争,而是士族之间的圈内斗争,从地域分野来看,应是山东士族与关陇士族之争。

牛党的核心人物皆为进士及第,还有进士带制科或明经进士出身者,李党除李德裕、郑覃外,其成员亦基本上是进士出身。李党出自山东士族,具有传统的家学渊源和优美的门风,虽进士出身,仍重视礼法,门风家学。牛党党人都以进士入仕为目的,重文采,已没有传统礼法约束,这是在武后当政后所培养的新兴集团。换言之,李党人士受传统家法的影响,不利用进士身份而攀附主考(座主)。而牛党人士所受传统包袱小,善用座主、门生、与同年的关系紧密结合,求取政场上的利益。在牛李两党中,科举出身的人都占有压倒多数,所以,不能说

李党基本的政治立场是“反进士”。至于李德裕废除呈榜,废除县长座主与门生、同年之间交往的曲江宴、雁塔题名等惯例,也不是否认科举制度本身,而是厌恶请托、朋党等给科举带来的流弊。

## 二、对待藩镇的态度

在对待藩镇的态度和对外的问题上的分歧,李党是积极用兵论,牛党是消极和平论。文宗曾向臣下询问天下太平之策,牛僧孺回答说:“无太平之像,方今四夷未至交侵,百姓未至流散,虽然非至治,亦可谓小康,陛下若别求太平,非臣等所及。”从这些话,可以看出牛僧孺的政治态度是以维持现状为根本。

大和五年(831年)幽州卢龙节度使部将杨志诚驱逐节帅李载义、求索节钺时,牛僧孺曾说:“自安史之乱以来,范阳非国所有。如抚之以捍北狄,必不午顺逆。”(通鉴)而会昌元年(841年),同样是幽州卢龙发生变乱,陈行泰和张绛以下克上,求索节钺。李德裕认为:“若置之数月不问,必自生变。”主张观望,向首先向朝廷表示恭顺态度的张仲武给予节钺。如果将牛僧孺与李德裕的态度作一比较,前者主张放手让幽州自立自擅,后者则与此相反,主张直接介入,尽可能的将“反侧之地”置于朝廷的间接统治之下。李德裕曾说:“河朔兵力虽强,但不能自立,须藉朝廷官爵、威名以安军情”。两者的姿态当然是有差异的。李党作为党派,其凝聚力是相当弱的,李党在对藩镇是否采取强硬态度存在着分歧,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,出李德裕外,李党领袖对于藩镇问题并没有什么像样的主张,这是事实。

## 三、与宦官的关系

牛李两党的分野,还表现在与宦官的关系上。文士是热衷仕进,原是唐代文士一贯精神,然从宪宗已降,中央政权几乎为宦官所把持,但宦官为了政治上的利益,也分派别,以获控制大权。士人为求政治上的仕进,皆与宦官有所依附,尤以牛党人士最为明显。两党各有依附宦官集团,两相结合成一体,掌控唐末内外朝廷。观其牛李党争的兴衰,实和內廷宦官权力的更迭互为表里。在党争的四十多年中,虽政治大权几乎为宦官所控制,但政事的执行,仍靠外朝大臣。牛李人士争权对唐代末年衰落的政权仍有实质上的影响。综观牛李党争始末,牛党是以李宗闵、牛僧孺为首,李党以李德裕为首,自唐宪宗初年李宗闵于对策讥李吉甫,吉甫之子德裕对此不满,于穆宗时伺机攻击李宗闵,于是双方各自树党,互相倾轧,然自安史之乱后,宦官手握朝政大权,双方为争夺政治上权力以打击对方,而各自依附宦官,以求上达。

两党政治争夺战,始自宪宗,互有更迭,大致来说,穆宗、敬宗二朝为牛党得势之时,及至文宗时,党争最烈,有时两党之人同朝为相。武宗时,为李党全盛时期,宣宗时,则为牛党全盛时期,宣宗以后牛李党争不复载于史册。两党人士虽然在政治上互相倾轧,然其不似今日政党,有党纲、党员名册,为政治理想而争,牛李党争的性质为权力之争,两党的差异性除出身背景不同外,最重要为对边患和藩镇问题的争议,主战、主和的不同,可从维州事件看出其两党之坚持,然其一贯态度,使得唐朝在用兵方面失之先机,甚至常为反对而反对,沦为意气之争。牛李当争虽和內廷宦官党派之争互为表里,然自甘露之变后,宦官们自成一气,同类相聚,不再让外朝大臣有所依附,虽使得牛李党争自宣宗以后不再出现,但却使得外朝大臣转而依附拥有地方兵权的藩镇,酿成崔胤结合朱全忠杀尽宦官之举,朝政大权落入藩镇手中,加速唐朝走上灭亡之路,影响所及,不容小觑。

作者简介:李艳丽,贵州大学2006级中国古代史研究生,研究方向:中国古代史。